

早期日本取引所の变迁及对日本经济成长的贡献

孙建华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取引所,对日本“殖产兴业”和产业革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产业革命开始后,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对外扩张,日本的取引所也在1896年后开始了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日本不能以互利共赢的思维及和平的手段去处理国际竞争与矛盾,而是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损人利己的排他性思维以及战争的手段去应对纷争,从而走上了对外战争和侵略扩张的道路,致使日本经济转入战时体制。而战时日本政府实施的经济统制政策又使得日本设在国内外的物品交易所丧失了存在的土壤,证券交易所则沦为战时财政的工具,扮演了为侵略扩张服务的战争金融角色,并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被取缔。近代日本取引所盛极而衰暨国际化经营失败的教训,可为中国的交易所殷鉴。

关键词: 日本取引所; 米谷取引所; 株式取引所; 殖产兴业; 产业革命

中图分类号: F1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8)04-0023-06

日本的取引所即交易所,起源于明治维新前各地政府为了维持米价稳定而在米集市实施的按米期票来买卖米谷期货的制度,但其办法实际上是仿效于泰西各国。从明治维新后至二战结束,近代日本取引所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殖产兴业、产业革命、经济萧条与整理、战时经济统制等历史阶段的演进。

一、明治维新后至二战结束日本取引所の变迁及国际化发展

(一) 殖产兴业时期日本取引所の产生和初步发展

日本国内取引所的发展以殖产兴业时期物品取引所の出现为其发端。日本最早的物品取引所是1876年(明治9年)设立的株式会社大阪堂岛米谷取引所(9月25日)、株式会社东京米谷商品取引所(9月27日)、株式会社近江米取引所(9月28日)、株式会社下关米取引所(11月3日)。这些物品或物券取引所均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制度,而且都是以米谷等农产品为交易的标的物。此后日本的米谷取引所继续发展,到1884年有11家米谷取引所(也称为米商会所)及米谷株式取引所,买卖米谷等商品^[1]。

在物品取引所设立之后,株式取引所也在日本相继出现。1874年明治政府仿效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制度,制定了日本的股票交易所条例,但是该法律因为不适合当时日本的国情而未能实行。1877年2月15日日本设立了物券兼营的株式会社新潟米谷株式取引所,随后明治政府又参酌欧美各国取引所の实例以及日本国内的交易习惯,在1878年发布修正的股票交易所条例。遵奉该条例,日本在1877年12月28日和1878年6月11日先后设立了株式会社东京株式取引所及株式会社大阪株式取引所,这是日本设立最早的专业的株式取引所。1884年后日本又设立了株式会社博德株式米取引所(1884年2月9日)。总计在1885年以前日本有4家证券或物券取引所买卖有价证券。殖产兴业时期,明治政府多次模仿欧美国家以会员制为主的取引所制度来构建本国的取引所制度,但都因脱离日本当时的国情而未能成功,其取引所在1877-1887年间基本上没有发展,无论是米商会所或是株式取引所,其家数和资本几乎没有变化。

(二) 产业革命时期日本取引所的大发展

产业革命时期,日本各地方政府和民间对于物券取引所可以疏通金融、流转货物、平准市价、维持财政等

收稿日期: 20180-05-22

基金项目: 中央财经大学史学系列丛书编写项目的子项目“近代日本在华交易所研究”(020250316005)

作者简介: 孙建华(1966-),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史。

作用有清醒的认知,因而在各地遍设物券取引所来满足产业革命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过,1893 年之前,明治政府发展本国取引所的思路与举措在某些方面仍然与本国的国情脱节,取引所的发展因此出现了波折。1887—1892 年间取引所性质的米商会所维持在 13 家,数量上没有变化,但是股本从 59.5 万日元减少到了 50.5 万日元。株式取引所则从 5 家减少到 3 家,股本从 60 万日元降至 40 万日元;附充资本从 60 万 6000 日元减少到 17 万 8172 日元。

为了解决日本物券取引所发展中遇到的问题,1893 年明治政府又颁行新修订的取引所法,允许股份制取引所和会员制取引所同时并存,允许取引所参酌地方商情自行选择其一,目的是以折衷的、过渡性的做法平稳地推动取引所制度从股份制向会员制过渡。由于举措得当,日本取引所制度的建设由此驶入了正轨和快车道。1893 年以后,日本又陆续设立株式会社名古屋株式取引所(1893 年 12 月 18 日)、株式会社长冈米谷株式取引所(1894 年 6 月 27 日)、株式会社神戸米谷株式取引所(1894 年 9 月 26 日)、株式会社甲府米谷株式取引所(1896 年 6 月 15 日)等股票取引所或兼营股票米谷的取引所。1893 年日本取引所的数量超过了 24 家;到 1896 年,日本国内取引所的数量猛增至 122 家,其中股份组织取引所有 114 家。日本取引所的发展“自明治二十六年十月现行取引所法实施以来,面目为之一变”了^[1]。

由于股份制取引所制度安排上存在缺点,加上取引所法定的营业区域多局限于市、郡、町、村范围,属于地方性的小取引所,而各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又很不平衡而且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有变化,所以此时的取引所也存在以营利为目的、一哄而起、供过于求、规模不经济、监管不力、投机无序、营业亏损等问题。1893 年以后,在日本的取引所里,“非独米谷及有价证券,可为交易之品。凡百货物,莫不可以入市焉。取引所如此其多,则其内或有折阅者,亦势所不免”^[1]。例如 1886 年设立的名古屋株式取引所就因为“创业以来买卖取引不振”而自行解散^①。1896 年后的 16 年间,日本的取引所停闭了 66 家。到 1912 年产业革命完成时,日本的取引所减少到 48 家,其中股份制取引所有 46 家^②。

这个时期日本的取引所开始国际化发展。日商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先后设立了株式会社仁川米豆取引所(1896 年)、株式会社牛庄取引所(1906 年)、信用组合辽阳取引所(1909 年)等取引所。

(三) 经济萧条和整理时期日本取引所的重组和海外扩张

1912—1937 年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时期,也是日本经济陷入萧条、进行整理以及取引所重组并向海外扩张的阶段。1914 年日本的物券取引所减少到 44 家,其中公司组织的取引所有 42 家,会员组织的取引所有 2 家^[2]。1914 年 8 月以后,由于欧洲战事日趋激烈,商路阻塞,所以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幅萎缩并对国内相关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而这又牵累到关联银行,使之出现不良贷款。这个时期日本的株式取引所与商业银行的关系较为密切,取引所的经营受到关联银行经营状况恶化的冲击。到 1915 年,日本的取引所减少到 42 家,全都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制度;其中株式取引所有 4 家,物券取引所有 6 家,其余的 32 家是以米谷为主要交易物件的米谷取引所。此时日本各家取引所的资本金相差悬殊,资本金在 100 万日元以上的取引所有 9 家,其余 33 家取引所的资本金都在 100 万日元之下,其中规模最大的株式会社东京株式取引所的资本金达到 2000 万日元,而规模最小的株式会社小樽取引所等 25 家取引所的资本金都只有 10 万日元。可见,经济萧条时期的日本取引所仍以地方性的小取引所为主。从设立时间上看,有 9 家取引所是在殖产兴业时期成立的,其余 33 家取引所都是在产业革命时期的 1893—1897 年间设立,其存续时间至少在 18 年以上,表明其经营还比较稳定。

一战期间日本经济高涨,1918—1920 年间日本的取引所回升至 44 家。从买卖物件来看,其中 34 家是米谷取引所,10 家是株式取引所^{③[5]};从组织形式上看,其中 42 家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占总数的 95.45%^④。为了改变公司制取引所独大的局面,日本政府借由 42 家股份制取引所即将营业期限届满,需重新

① 名古屋株式取引所解散入。公文类聚。第 13 编·明治 22 年。第五十七卷·民业坑业附二·商事·工事·坑业,农商务省档案,明治 22 年(1889 年)11 月 25 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类 00442100。

② 取引所一覧(其二) [B]。日本取引所关系杂件。海外。满洲取引所卷一,外务省外交档案,大正十四年(1925 年)3 月 25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E-2-4-0-1-1-3-001。

③ 取引所一覧表。取引所成绩一覧表。昭和财政史资料第 2 号第 35 册,大藏省档案,大正 13 年(1924 年)9 月 30 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平 15 财务 00202100。

④ 取引所一覧(其二)。日本取引所关系杂件。海外。满洲取引所卷一,外务省外交档案,大正十四年(1925 年)3 月 25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E-2-4-0-1-1-3-001。

申请营业许可证书及营业展期的机会,在1920年4月公布新修订的取引所法,发布拆毁取引所令,整顿原有的取引所,希望逐渐淘汰旧有的股份制取引所,而一以会员制取引所为归宿^[3]。此次整顿,日本政府允许27家股份制取引所沿袭其原来的名称和买卖物件并展期10年继续营业;另外允许4家股份制取引所调整买卖物件和更换名称后展期10年继续营业;其余11家股份制取引所不予展期,营业期限届满则停业解散。这样,到1924年,日本的取引所减少到了34家,其中11家是株式取引所或证券物品取引所,23家属于米谷取引所^①。虽然整顿后的日本取引所仍以股份组织为主,有33家取引所选择了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但是取引所的组织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股份组织的取引所数量较过去减少了,另一方面新设了部分会员组织的取引所。到1925年底,日本的取引所回升至35家,其中有3家会员制取引所^②。此后,又有神戸大豆粕取引所(1927年4月)和东京砂糖取引所(1928年)等新的会员制取引所设立。日本取引所的结构在此次整顿后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扶持会员制取引所发展的政策导向。

这个时期也是早期日本取引所国际化扩张的重要阶段,在华设立取引所则是其重头戏。在1896年株式会社仁川米豆取引所设立后,日商又依据朝鲜总督府颁布的《市场规则》,在朝鲜设立了釜山谷物商组合谷物市场、群山谷物商组合谷物市场、大邱谷物商组合谷物市场、株式会社京城株式现物取引市场等交易所。另外,继1913年官营大连重要物产取引所设立之后,日商又在中国关内外的开原(1915年)、长春(1916年)、哈尔滨(1918年)、上海(1918)、公主岭(1919年)、铁岭(1919年)、四平街(1919年)、奉天(1919—1921年)、辽阳(1909—1920年)、营口(1920年)、安东(1920年)、青岛(1920年)、天津(1920年)、济南(1921年)、汉口(1922年)等商埠设立各类取引所。到1922年,日商在华设立的取引所及其类似会社至少有30家。

(四) 战时经济统制时期日本取引所趋向衰亡

1937年之前,日本战时经济统制的实施范围与程度还有限,其经济计划并没有完全排斥和取代市场机制的经济调节作用,物品取引所仍有其存在的土壤和必要性。据调查,到1937年5月6日,日本国内仍有26家专营或兼营物品买卖的取引所,其中6家为会员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不断强化战时的经济统制,市场机制的作用被限制和排斥,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或海外占领区的货物通过有组织的市场流转的土壤和条件消失。日本帝国辖区内的物品取引所及物券取引所的商品部,因为政策体制的限制及业务的萎缩而相继解散或关闭;株式取引所虽然适应战时公债交易及当局引导游资、缓解通胀压力的需要而继续营业,但也在日本政府主导下走向统一并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被关闭。

1942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金融统制团体令》,设立全国金融统制会。1943年3月11日,日本第81届议会通过了新的《日本株式取引所法》,着手改革战时日本的株式取引所制度,使之适应战时经济统制和统制金融政策的需要。此次取引所制度改革的要点是要求日本国内所有尚在营业的株式取引所完全停业,设立全国唯一的日本株式取引所,并将该新株式取引所置于政府的有力监督之下,形成有价证券的公允市价,活跃证券的流转,进而帮助国家经济以支持穷途末路的对外战争。1943年7月1日,日本政府依法合并国内所有的株式取引所,成立了营团法人组织的日本株式取引所。实际上这家“新制度取引所与政府已成为表里一体的国家机关”^[4],其营业活动更多地扮演了为日本对外战争服务的战争金融角色。至此,日本在强化金融统制的政策体制下实现了国内取引所的统一。不过,随着日本的战败,日本这家新成立的株式取引所在1946年被美国占领军宣布解散,直至1949年1月,美国才同意东京株式取引所重新开业。

这个时期也是日本取引所国际化经营走向失败的阶段,日本在朝鲜、台湾、中国大陆等海外殖民地或占领区的物券取引所也受战争的影响而趋向衰落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结束。

二、取引所以对近代日本经济成长的贡献

取引所是有组织的市场和重要的商业辅助机关,在支持日本经济成长并向海外扩张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一) 稳定米价和社会,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

近代日本的取引所以米谷取引所为主,主要交易对象是大米等食粮,其交易方式分为直接交易(即现货交易)、延期交易(即远期交易)和定期交易(即期货交易)。以1913—1917年为例,日本37家米谷取引所的大米定期交易成交量从8406万5800石增加到3亿6108万9150石,其中株式会社东京米谷商品取引所和株式会社大阪堂岛米谷取引所两家的交易量最大,前者的大米定期交易成交量从2566万1400石增加到

9936 万 8800 石,后者大米交易量从 1621 万 4130 石增加到 9640 万 5600 石^①。定期交易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可以降低农产品价格波动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的市场风险,有助于稳定大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并引导其现货交易的价格,对大米的直接交易和延期交易具有引领作用。日本的米谷取引所在调剂各地米谷供求、平抑食粮市价、安定社会、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控制工资水平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垄断资本利润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

(二) 便利企业融资,支持产业经济发展

明治政府成立后,为富国强兵而决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本政府鼓励民间以股份公司组织来动员社会资本,创办新式企业,1872 年第一国立银行成立后,日本“所发行之公债证书其额渐多,银行会社设立益众,其株式从之增加……”。因此,1877—1878 年后东京和大阪证券等“取引所之创立,可谓适时矣”^[5]。

据日本内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14—1929 年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法定资本金及债券发行总额从 59 亿 5947 万日元增至 316 亿 1674 万日元。1929 年日本的有价证券总额约为 320 亿日元,而日本的国民财富为 1023 亿日元,也就是说此时日本国民财富的三分之一已经有价证券化。而日本国民财富和融资的证券化与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催化作用是分不开的。1878—1892 年间日本的株式取引所每百元股本的溢利从 310 日元增至 1995 日元;1893—1896 年股份制取引所每百元股本的溢利在 2887 日元至 1017 日元之间,盈利可观。而日本“取引所如此其多……然其利益尚如此其多,则富贾买卖之额必为数甚鉅”。1913—1917 年间日本株式取引所定期交易的股票成交量从 1809 万 5568 股增至 5933 万 7660 股^②。1937—1941 年间日本所有株式取引所的股票交易量虽然从 3 亿 7771 万 4284 股降至 2 亿 6716 万 6462 股,但其中的股票实物交易量从 1564 万 2144 股上升至 3077 万 762 股,实物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比例从 4.1% 提高到了 11.5%。1907 年在东京株式取引所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债券总额还不过 5 亿日元,而到 1929 年已跃升至 93 亿日元,30 年间增加了大约 20 倍。到 1931 年,东京株式取引所上市的股票,远期、近期及现货,合计有 1052 种,股票数量达到 1 亿 888 万 5376 股,而债券有 476 种^[6]。1897 年至 1929 年间,东京株式取引所的股票成交量从 500 万股增至 5100 万股;而债券交易量则从 200 万日元增至 8 亿 4000 万日元。1933—1942 年间东京株式取引所的股票近期与远期交易总量从 1 亿 1142 万 5260 股增至 1 亿 3827 万 5400 股^[7]。对于日本株式取引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及其作用,中国人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古所谓一日千里者,谅亦如是而已。更对比国家财政统计与一般经济统计,益证市场发达,与产业经济之发展及国家财源之增大,关系密切而不可须臾离焉”^[1]。

(三) 发挥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交易所是市场核心,与国民经济及国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日俄战争胜利之初,日本并没有从强硬的俄国哪里获得战争赔款,这严重挫伤了日本国内投资者高涨起来的投资热情,以致 1905 年 9 月以后日本株式取引所的股票价格下跌。例如东京股份的股价下跌了 26%,日本精制糖和日本邮船的股价下跌了大约 16%,钟渊纺织的股价下挫了 14%。然而,日本从沙俄手中承继了在华的部分利权,又使得日本在 1906 年再度出现了兴办企业的热潮,企业利润的显著增长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因此上涨。例如 1905 年 7 月至 1907 年 1 月间,在日本株式取引所挂牌上市的东京股份的股价又从 50 日元/股飙升至 780 日元/股,而钟渊纺织的股价则从 50 日元/股飙升至将近 300 日元/股。此后,随着企业兴办热潮终结、经济危机爆发和大隈重信等政界人士发表经济悲观论,日本株式取引所的股价又在 1907 年 1 月 21 日之后出现暴跌,例如在取引所上市的东京地区的会社股价又从 1 月份 780 日元/股的最高价跌至 91.6 日元/股。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国内投资者认为战争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景气,预期企业利润及分配的股息红利会增加,因而纷纷入市购买股票,致使株式取引所的股价不断上涨。1914 年 8 月中旬,股价最高涨至 130.4 日元/股,已接近战前 7 月中旬的 130.55 日元/股的最高价。而在 1930 年“昭和金融危机”降临、金本位制瓦解、全球金融市场震荡时,日本投资者的信心受到重创,又导致东京和大阪株式取引所再次陷入混乱并停业^[8]。1931 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局势骤然紧张,日本投资者的信心大受打击,东京、大阪株式取引所的证券市价因此暴跌。在日本因为国联拒绝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出该组织以示抗议时,

① 临时国民经济调查会参考资料第九号,取引所一览附关系法规,各种调查会·委员会文书,临时国民经济调查会,内阁档案,大正 7 年(1918 年)9 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委 00247100。

② 本官方的强力干涉和整顿下沦为战时财政的工具,扮演了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战争金融的角色,并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被取缔。近代日本取引所盛极而衰暨国际化经营失败的教训,可为国际化发展的中国交易所殷鉴。

投资者因担心日本国际关系恶化会冲击其经济,遂抛售股票,以致1933年2月15日东京株式取引所の股价在午前暴跌并在午后停止营业^[9]。日本取引所对国内外政治与财经情势的敏锐反映,赋予其“一叶知秋”的经济感知功能,使其“所负使命,不啻为财界之晴雨表”^[6],在现实经济中发挥了聚散经济信息、引导投资、为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等作用。

(四) 支持和服务财政

近代日本取引所对财政的贡献较大,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株式或物券取引所作为公债发行与流通的场所,为日本政府的公债发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而明治维新后公债发行收入是纳入日本政府预算的。1878—1883年东京株式取引所公债定期交易的成交额从1787万3200日元增至5358万300日元,其中1881年的成交额高达2亿1790万9300日元;大阪株式取引所公债定期交易的成交额则从537万8300日元增至2353万8400日元,其中1881年的成交额最高,达到8752万1600日元。1916年东京株式取引所公债实物交易成交额达到4566万2200日元,大阪株式取引所公债实物交易成交额为136万6000日元;而到1921年时,东京株式取引所公债实物交易成交额已增至2亿1320万6175日元,大阪株式取引所公债实物交易成交额则增至8477万2900日元^①。如果算上这两家取引所其它交易方式的成交额,再加上其它取引所的交易额,可以推知此时日本株式取引所及物券取引所流转的公债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是日本取引所直接向财政贡献了部分税收。日本的取引所最多时达到122家,而且多为股份组织,以营利为目的,其自身上缴财政的税收也不少。1913—1917年间日本42家取引所的手续费收入从611万9574日元增至938万562日元,各年平均的手续费收入为659万6693日元,各年平均的纳税额达到222万499日元。1935年日本11家证券和物券取引所的营业收入为1717万3000日元,其中买卖手续费收入为1317万7000日元;纯收益为982万5000日元,其上缴财政的各项税金为286万4000日元。如果算上物品取引所,则取引所上缴财政的税金更多。

再次是取引所的关系人也向财政贡献部分税收。1913—1917年间日本42家取引所的股息率在0.24%至3.00%之间,平均股息率为1.18%^②。1935年11家证券和物券取引所分配的股息为731万2000日元^③,算上物品取引所,则取引所分配的股息总额更高。取引所的股东、职员、经纪人、会员、交易委托人从股利分配、薪金和交易中获得收入,也向政府纳税。

三、余论

早期日本的取引所是在日本政府引导和推动下,仿效欧美的交易所制度,结合本国的实际建立起来的,并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以米谷取引所为其主体;二是日本的取引所大多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三是长期存在取引所兼营证券与物品的情况;四是取引所的发展始终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干涉。这些特点对1906—1945年间日本取引所在华的布局与活动也有影响:首先,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对于中国大陆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市场和特产物有巨大的需求,因而日商在1906年后于牛庄等地设立了数量众多的各类交易所,其中专营或兼营米粮的物品交易所最多。其次,除了1909年设立的信用组合辽阳取引所以及1919年改组设立的会员组织大连日华证券株式会社(实为交易所类似组织)之外,日本官方和民间资本在华设立的其它交易所都仿效国内做法而选择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再次,国内部分人士认为物券综合经营是日本等国交易所经营的惯例之一,而且1906年后日本在华设立的牛庄取引所等交易所也兼营物券买卖,大有垄断中国各地市场之势。有鉴于此,中国自设的交易所要取得范围经济的竞争优势,有效抵制日本在华取引所的扩张,也有必要综合经营。1920—1922年间,华商在中国各地设立的物券交易所竟达86家之多。最后,产业革命完成后,日本政府还介入日本在华取引所的扩张活动中,不仅在中国东北和关内地区设立了听命于日本官方的大连取引所等官营交易所,而且还主导了部分在华交易所的并购重组活动。

① 国债长期清算取引に関する件。昭和财政史资料。第1号。第82册,大藏省档案,大正14年(1925年)9月29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A08071670000。

② 临时国民经济调查会参考资料第九号。取引所一览附关系法规。各种调查会・委员会文书。临时国民经济调查会;内阁档案,大正7年(1918年)9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委00247100。

③ 株式取引所概要参考诸表。昭和财政史数据第7号第16册,大藏省档案,昭和11(1936年)年9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平15财务00820100。

产业革命开始后,日本的经济力量日渐膨胀,国内市场饱和以及资源匮乏促使其经济暨取引所向海外扩张。在对外扩张经济的过程中,日本面临的国际竞争与矛盾加剧。日本不能以互利共赢的思维及和平的手段去解决纷争,而是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损人利己的排他性思维以及战争的手段去应对纷争,从而走上了对外发动战争和侵略扩张的道路,日本经济因此转入战时体制。日本政府实施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促使国民经济计划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被排斥,这使得日本设在国内外的物品交易所丧失了存在的土壤。而证券交易所则在日本官方的强力干涉和整顿下沦为战时财政的工具,扮演了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战争金融的角色,并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被取缔。近代日本取引所盛极而衰暨国际化经营失败的教训,可为国际化发展的中国交易所殷鉴。

参考文献:

- [1]高山林次郎.日本维新三十年史[M].古同资译,华通书局,1931:416-417;419-420.
- [2]张克俭.证券交易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6.
- [3]何勤华.日本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5-270.
- [4]敬之.日本证券交易所制度改革[J].中央经济月刊,1943,3(6):24-29.
- [5][日]付岛八十六.开国五十年史[M].开国五十年史发行所,1909:1146.
- [6]佚名.三品取引所最近概况[N].申报,1930-03-08.
- [7]绵翼.日本株式取引所及交易方式[J].企业周刊,1943,1(48):5-6.
- [8]庞宝庆.近代日本金融政策史稿[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84-86,102,134,139,160.
- [9]Slump on Tokyo Stock Exchange[N].China Weekly Review(1923-1950),1933-02-18.

The Change of the Japan's Exchanges in Early Tim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Japan

SUN Jianhua

(School of Financ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Japan's exchanges developed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ha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dustry breeding and business initia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gan, with the expansion of Japanese economic power and expansion abroad, Japan's exchanges also bega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fter 1896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outward expansion, Japan cannot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ontradictions by mutual benefit and peaceful means, but deal with disputes by the exclusive thought of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and the means of war, thus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outward war and invasion and expansion, resulting in the transition of Japanese economy into wartime system. In wartim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economic controlling policy made those exchanges of goods at home and abroad loses the existing soil; the stock exchange became the tool of wartime finance, played the war financial role in serving for the aggressive expansion and was banned after Japan was defeat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lessons of the modern Japanese exchanges falling into decay and its failur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business can be a reference for China's exchanges.

Key words: Japan's exchanges; rice and grain exchanges; stock exchanges; industry breeding and business initiat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责任编辑:黎芳)